

# 知识分子只该服膺真理

不久前,知识界出了一件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北京的一位学者吴法天跟一名女记者周燕在微博上约架,后来他们真的约成了,吴法天挨了周燕小姐几拳,被护送离场。

最近有很多人说什么知识分子怎么能这样,这是不是有辱斯文?也有人说什么,我早就想抽这个吴法天了,他太欠抽了,于是就有人讨论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再看过去几年,我们还目睹了很多知识分子吵架的事,最受关注的当然是方舟子先生和韩寒先生所谓的“方韩大战”,到最后,出现了两派,这两派当中,我都认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过去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或者同事,都因为这个事件,反目成仇,要绝交,有些不止绝交,还要把对方十多年来不可告人、不堪入目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过世的、我很敬佩的大哲学家科亨,他是一位左派学者,专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使得马克思重新变得有意义的哲学家。他在2009年去世时,很多英美主流媒体都发悼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很有名的学者德沃尔金写的。德沃尔金的很多观点跟科亨截然不同,他们自1960年代开始认识,天天做学术辩论,立场截然不同,辩论了几十年,但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这两个人还曾在伦敦大学开设了一门课,这一门课在英国或者在全世界做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人称“星球大战课”,教这门课的是四个人,他们不是轮流上,而是一起上,今天轮到A主讲,然后另外三个人马上反驳他,这四个人都是当代哲学界、政治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我刚才说的科亨和德沃尔金,还有一位严肃的分析哲学家派帕菲

一个乘客的车站

法律条文固然要求严谨缜密,但如果过于死板和绝对,却同样也会“好心办坏事”,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法律都不鼓励人们加班加地点工作。在瑞典的阿斯特普市,法律则干脆规定,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加班加地点工作。这项规定的初衷本是要维持同行业从业者之间的竞争公平,但这种过于绝对的做法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例如每到节假日,大大小小的商铺就会门窗紧锁。就是在平时,过了19点就买不到东西,这就害得瑞典人总要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不过麻烦可远不止这些。有一天,阿斯特普市的一名警察发现一个从一家电器商店偷了东西,于是立即追了上去。眼看着就要追上小偷时,教堂大钟敲响了11下,警察戛然而止。原来他的下班时间到了,再追就违反了法律,即使抓到小偷也不能审判,还会被小偷反告一状,于是这名警察只好“望贼兴叹”。

英国一个叫高维甘比的小城市也有一条独特的规定:新市长上任时要过磅,并向市民公布体重。等到市长离任时,还要再称一下体重,如果体重下降了,即使市长在任期内没有做出多少成绩,也会得到市民的肯定。这条规定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因为该市的居民认为市长是人民的公仆,应当鞠躬尽瘁地为市民服务,而不能养尊处优。但这却苦了历任的市长大人,他们往往被迫在上任前吃补增肥,离任前节食减肥。

在肯尼亚,法律规定自杀是犯罪行为,因此对于自杀不死的人还要判刑。曾有一位地方官员因为迟迟拿不到自己应得的债款而自缢,被人发现后救下。后来,法院竟判了他3年徒刑。对此,他表示强烈不满:“既然不许我死,就应该叫我好好好地活着啊”!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旧金山市的一条法规:“禁止在人行道上拍打地毯,除非是在午夜到上午八点之间”。这条法规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地毯上的灰尘弄脏过路的行人,不过这可害苦了当地居民。他们往往会在午夜时分被重击的声音惊醒,因为邻居只能在此时清理地毯。而之所以采用重击拍打的方式,其实同样是因为不想坐牢——旧金山市的另一条法规规定:“午夜至上午8点之间禁止使用吸尘器”。(摘自《探索揭秘》刘勇/文)

## 皇帝为何偏爱“一二”将

李世民偏爱程咬金,李隆基与杨玉环宠爱安禄山,梁山头领宋江喜欢李逵,岳飞推崇牛皋,李自成纵容刘宗敏……历史上那些被偏爱的将领都具备一个共性:有点儿“二”。

这些有点“二”的将领,之所以受到上司的赏识,大概离不开“纯朴”的可爱。所谓“纯朴”,是需要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作保证的。在“纯朴”的前提下,上司不仅偏爱他们,而且还能容忍他们的异见。相对于深刻的异见,上司们更喜欢纯朴的异见。

比如李自成对刘宗敏和李岩的态度就迥然不同。李自成纵容刘宗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刘宗敏强占吴三桂爱妾陈圆圆,拒不出兵山海关,敢在武英殿军事会议上顶撞李自成,并扬言“大家都是做贼的,凭什么你在京城享受,让我去前线卖命?”如此粗暴的态度,李自成都忍下了,但是对温文尔雅的李岩却水火不容。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李岩乃大智,才华在上司李自成之上,而刘宗敏虽然粗暴,却头脑简单,在智力上不是李自成的对手。李岩之所以被李自成弄死,就是因为他表现得不够“二”,他的异见太深刻了,一点也不“纯朴”。自然李自成很介意不喜欢。

李岩死于不“二”,而安禄山则属于“装二”。众所周知,盛唐终于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主角是胡人安禄山。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期,唐玄宗和杨贵妃对这位胡将是恩宠有加、毫无防范的,并非唐皇眼拙,而是这位将军太会装傻充愣了。作为一位雄霸东北的军阀,安禄山不可能是省油的灯。但在唐玄宗面前,他不仅大作忠勇状,而且不时冒傻气。

唐玄宗曾开玩笑指着安的肚子说:“这个人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怎么这个大概?”安禄山答:“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只有一颗赤心!”唐玄宗叫安禄山拜见太子,安禄山不行礼。左右的人催促他下拜,安禄山站着说:“我是胡人,不知道朝廷的礼仪,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唐玄宗说:“这就是储君,我死后,他代替我领导你们。”安禄山说:“我很愚钝,过去只知道陛下您一个人,不知道还有储君呢。”做出不得已的样子,然后下拜。

安禄山要做杨贵妃的干儿子。唐玄宗与杨贵妃一起坐着,安禄山先拜杨贵妃。玄宗问为什么这样,安禄山回答:“我们胡人就是先拜母亲后拜父亲”。只认老子不认儿子,尊重老婆甚于自己,这么“二”的封疆大吏,真令皇帝又开心又放心,怎能不喜不自禁?待到此狐变狼时,唐唐明皇大跌眼镜不敢相信,自己竟被那么冒傻气的家伙忽悠了,原来自始至终都是“伪豪爽”,“伪忠诚”。

“二”者多福,自古以来,也是中国历史中不成文的一项游戏规则。

(摘自《廉政瞭望》2012年8期 程万军/文)

疼惜女友固然是好的,但把一个成年人按照婴儿的方式“宠”着,只能让对方成为无法应对社会正常压力的“不健全人”。

从更大的社会层面来说,中国人对于一些本该严格惩罚、毫不姑息的错误,也表现得太过“宠爱”。前几日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某市一位领导去工商局视察,要求他们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加强力度,并“高度肯定”了他们已取得的工作成绩,特别表扬了他们今年上半年的工作。

这在我看来,又是一种过度“宠爱”——“宠爱”与爱护应该是边界分明的。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形势如果移到日本,领导不破口大骂已是万幸了,要听到他的好话是绝对不可能的。管理得好是本分,管理得不好要严惩,这是被普遍接受的原则,官员永远远应在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状态。

“宠”是否能让人变成龙,又让中国龙真正腾飞?我觉得很难,因为一旦被“宠”,便是一半被关进了牢笼。中国人应当克服过度的“宠爱”和“保护”心态,以更大的平常心让个人与社会真正经风雨、见世面,走向更大的辉煌。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28期 关田刚司/文)

# 新中国“22 大明星”诞生记

6月底,陈强、张瑞芳两位老电影艺术家相继去世,他俩都是1962年评出的新中国“22大明星”成员。近日,“22大”中的王晓棠、秦怡、于蓝、庞学勤和谢芳,分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谈及当年的评奖始末。

新侨会议上周恩来的提议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联合主办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在新侨饭店召开,也称“新侨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重提“双百”创作方针。

会议期间,6月22日,周恩来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30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小聚。

在谈到明星体制问题时,周恩来认真地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为什么不挂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

原来,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发行过一套苏联电影演员的大头照片,辅以他们的代表作品的剧照,悬挂在电影院、工人俱乐部里。

周总理叮嘱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要把中国自己的明星选出来,挂上去。

评选的标准

新侨会议之后,文化部迅速行动起来。宣传“我们自己的明星”的具体工作,被交给了文化部下属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中影公司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模式,在上报文化部

当年为挣钱情愿苦扛麻袋包

插队第二年,队长对我说,小胖,粮库下来一个招工名额,粮库是全民单位,活是累点,工资待遇好呀,我看你身体棒,能干,让你去吧。

粮库工人听听蛮好,实际上同电影上黑暗的旧社会扛麻袋的苦力是一样的。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一百六十斤的麻袋包不离肩。在粮库里扛扛麻袋还算好,最怕卸车装车。火车一到,把粮食从车上卸下来倒入粮仓,原粮是带土的,麻袋口子一拉,哗,粮食倾泻入仓,灰尘蓬起,工人面对面都看不清。卸车是卡时间的,我们一个接一个装,卸,一路小跑步,想偷懒都偷不成。一车粮卸好,人好像从灰堆里钻出来,眉毛眼睫毛都被灰尘沾汗油污结牢了。

生活是吃力的,工资是高的,计件制,扛多少麻袋拿多少钞票。我这个身坯月月拿五十多块,那个瘦光五十多块相当于22级干部,这份工资乡下好养八个伢儿嘞。

粮库头儿手拱拱一点生活不做,以工代干就做菩萨,我们供他。供就供吧,恨的是他欢喜报功欢喜邀能,一心想往上爬。他写了篇东西报告上面,说粮库工人特别能战斗,三九寒天零下三十摄氏度,干得热气腾腾只穿一条裤衩,气死帝修反。

上面的头儿来参观了。确实同报告上一样,我们这些人身赤膊,下身一条短裤,肩膀上顶着个大麻袋川流不息地上肩、卸货,一路小跑。

上面的头儿看呆了,指着旁边披大衣的粮库头儿说:你,你简直把他们当日本鬼子手里的劳工!这样是不行的!

头儿偷鸡不成蚀把米,被骂了一顿。他连忙找来技术人员,先学习毛主席语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说,粮库的根本出路也在机械化。要于机械斗争的高度认识机械化。勒令他们搞机械化装置。技术人员捣鼓了一阵,机械化的传送装置弄出来了。

机械化传送麻袋,人轻松了。问题又出来了。麻袋不扛叫我们吃西北风去?扫扫地,过过称,一个月才二三十块。扛麻袋的辰光,最结棍的一个月可以做到六七十块。大家都肉痛钞票少了。背地里骂,操,这鸟玩意儿,砸了它!当真有人动手。机械化装置时不时出毛病,不是皮带断了就是零件烧掉了。

机械化修来修去还是不停地出毛病,修理费用上去了,头儿烦死了,说,我操,这鸟玩意儿硬是不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没治了。拉倒吧。

我们这帮人又天天扛麻袋包了。

(摘自《西湖》曾琦琦/文)

的《调查情况说明》中建议:大面积地在电影院、娱乐场地以及与文化艺术相关联的地方,悬挂广大观众最欢迎和喜爱的演员剧照或个人照片。

夏衍当即批示同意。

文化部的指示下达后,中影公司立即草拟出一批演员名单,以文化部的名义下发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征求意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原意,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

根据指示,四大制片厂分别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培养的演员。文化部将名单上报周恩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平衡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搭配比例,并考虑他们所演的影片的影响力,最后综合评定了名单。最后的名单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瑞芳、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上官云珠、孙道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心刚、田华、王晓棠。另外还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因《红色娘子军》影片而红透一时的祝希娟。

评选的标准是相对宽松的。

赵丹主演的《武训传》1951年全国公映,最初好评如潮,但很快被认为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饱受批判,在50年代初期发展成“新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赵丹依然入选了“22星”。

为什么不多不少评22个影星?对此,有多种说法。



## 邓小平黄山巧遇“白发魔女”

这张照片是邓小平唯一和香港电影演员的合影。1979年7月11日至16日,75岁的邓小平徒步登临黄山,巧遇拍摄《白发魔女传》的香港剧组。于是剧组热情邀请邓小平合影,盛情之下,邓小平欣然接受。这张照片上,左边的女演员是饰演“白发魔女”的鲍起静,右边是男演员方平,两人是同行也是夫妻。

(摘自《天津日报》7.12)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麻雀曾是“四害”(“四害”分别为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之一,被全面围剿。在1958年,仅上海一地,就开展了两次大规模消灭麻雀活动,580万上海市民参加,消灭麻雀62万多只。在这场灭雀活动中,上海共有72人受伤,5人因误食了毒麻雀的米而中毒死亡。而因人们爬屋顶捉麻雀或插旗呐喊,损坏瓦片达100万块以上。

进入60年代后,“四害”名单上的麻雀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臭虫。

麻雀为何要人人喊打,又为何被平反?

1956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文章说:“据我们饲养试验,一只体重约六钱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约二钱,为身体的四分之一强,根据这个数字推算,一只麻雀一年消耗谷物约四斤。在野外活动的麻雀,因为终日飞翔跳跃,食量当更大,被它们吃掉和糟蹋掉的粮食一定更多。”

四天以后的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除四害》社论。社论完全引用了郑作新文章里提供的

一个比较广泛的说法是,这是仿照苏联的“22大人民影星”得来的。90高龄的秦怡则提供了一个传闻:1961年,苏共22大召开,“那时候不是批苏修嘛,讲着讲着就出来了”,于是,“22大”之说就叫开了。

找不到明星的感觉

1962年春夏,全国各大影院的苏联明星照被撤下,换上了“22大明星”的照片。在强调国家和集体、批判个人名利思想的那个年代,“22大明星”们自己,对当明星却并不敏感,甚至有些回避。

“去了电影院,也躲着,生怕被人看出来。所以光知道挂了你照片,但不知道是哪一张。”于蓝回忆。

时年27岁的谢芳当时只演过《青春之歌》,跟其他影星比起来,还是刚出道的小字辈。1963年她演完《早春二月》之后出访日本,《青春之歌》的剧照有一层楼高,她乘坐的小汽车在人群中艰难地移动,很多年轻人亢奋地追着车跑,她才回过神来,这就是成名了啊。

可惜好景不长。1963年、1964年中央接连发出批示,认为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由此,文化部以及各文艺单位开始整风,夏衍、陈荒煤等人受到批判。

1964年9月27日,文化部电影局发出《关于撤销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的通知》。在全国电影院、工人俱乐部等放映场所悬挂了两年零五个月的“22大明星”的大幅照片,从此消失。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25期 杨敏/文)

(我家先生)王蒙理论先行的做法,以至发展为生硬的教条主义:天气预报如果说没雨,那么出门时,即使天正在下雨,他也不会打雨伞;室内的温度计明明放在散热器附近,表内的指示度数肯定偏高,即使室内再凉,他也不觉得。一次冬天在外地住旅馆,他调了一阵空调后,立即说温度升高了,我说感觉反而凉了,最初他不相信,经过检查,确实吹进来的是冷风。我们还在新疆时,一次,好友李洪看

## 王蒙这个“教条主义者”

见王蒙洗完的衣裳搭在院子里的绳子上,满是一缕缕的褶子,还湿淋淋地往下滴水。她十分怜惜地对王蒙说:“你要是没劲儿,就别洗了。”其实,王蒙并不是没劲儿,而是有一篇文章说洗完衣服不能用拧干,否则会伤害织品。从此,王蒙洗完后来晾晒的衣服都是水淋淋的。

若是你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认识王蒙,准以为他是个锋芒毕露多棱多角的人物,但是,他的老实规矩,你是意想不到的。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有点儿近于死板。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多次回北京探亲,但是王蒙不肯与我同行,他说没有请示,自己不好擅自行动。他在遵守时间方面,毫不通融:每次用车他说几点到,你就一定要准时;你如果搭他一次车,动作慢半拍,他都会跟你发火;出访1个月,或是3个月,他决不会在返程时晚1天,这是他给自己制定的纪律。每天上午是他的黄金时间,用来写作,这个时间他是不允许轻易被他人占用的。

王蒙喜欢用他所信奉的理论去指导他的行为。他若知道一点儿道理,就会忠实地做理论的奴隶。干脆说,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王蒙是一个十足的教条主义者。(摘自《我的先生王蒙》方旋/著)

麻雀的悲喜剧

数据,得出了“全国被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比老鼠少”的结论。那么老鼠吃掉的粮食是多少呢?是3.5亿多斤。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所以,“吃粮食不比老鼠少”的麻雀,自然就成了人民公敌,被列入“四害”名单。

然而,就在麻雀被大批消灭之后,很多地方的病虫害灾害却日益严重起来,一批科学家开始上书,要求为麻雀平反,这其中也包括郑作新先生。现今,中科院动物所拍摄的电视片中有这样的描述:“曾经遍布城乡、数量众多的麻雀不幸被列为四种有害动物之一,并遭到大规模灭杀,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就在这时,郑作新和同事们顶着世俗观念的压力,深入农村,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开始对麻雀进行了调研,通过对848份标本进行解剖、鉴别和分析,他们发现,身披恶名的麻雀,仅在七八月间才啄食庄稼,而秋收后的整个冬天它都以草籽为食,让人惊讶的是,每到春天,它们都会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对农业害虫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终,科学家们为麻雀平反的意见被中央接受,1960年3月18日,麻雀被正式正名,不再是“四害”之一了。

(摘自《文汇报书周报》8.4 邵大星/文)

那事

那图

那人

那时

那物